論　著

五四女性的政治取向與形象塑造：以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為例 *

秦　方 **

摘　要

本文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為研究對象，通過展現其對五四運動的參與及之後的生命歷程，來分析近代性別和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三位

* 本文初稿初次發表於 2017 年 12 月 14-15 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的「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工作坊，修改後發表於 2018 年 6 月 19-20 日舉辦的同名國際會議上。在兩次發表中，感謝余敏玲老師、劉季倫老師的評議，以及與會者提出的寶貴意見。最後，亦感謝三位匿名評審人對本文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收稿日期：2018 年 9 月 2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 年 1 月 18 日。

**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女性可謂五四世代典型，但因家庭背景、社會角色和個人風格之不同，其個體差異隱於五四世代的同質性之下，並發揮作用。此後，這三位女性的人生道路與近代的政黨權力緊密交織在一起。她們對政黨的參與方式以及與政黨的距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她們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命運和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定位。但同時，在其身後，這些女性的後人和研究者又根據各自的訴求對她們的官方定位進行挑戰和修訂，從而塑造更為豐富的人物形象。總而言之，這三位女性的生命歷程及其形象塑造為我們展現了性別與政治權力相互博弈之下的複雜面向。

關鍵詞：五四世代、劉清揚、郭隆真、張若名、政黨權力

本文以劉清揚(1894-1977)、郭隆真(1894-1931)和張若名(1902-1958)三位女性為中心，分析在近代歷史進程中，個體生命如何與愛國、女權等社會思潮和政治運動，以及與政黨組織、國家政治等宰制性權力機制進行協商，並由此在歷史的記載與遺忘中尋求定位。劉、郭、張三位女性可謂「五四世代」之典型。[1] 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這三位女性主要以學校教育為身分認同，其名不顯；但在 1919-1920 年間，她們以天津為活動中心，聯合天津及其他城市的社會各界，主動參與了一系列因國族主義而引發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可以

---

1 有關「世代」或「代際」的概念，見 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pp. 13-22.

說，五四運動直接促成了這三位女性與其他參與者們對過去的重新思考，並成為他們強化代際意識、確定代際邊界的標誌性事件。

但是，五四世代並不止於此。本文試圖從兩個視角更進一步豐富對五四世代的研究和思考。一是回到五四時期當下，對五四世代進行性別化和差異化的分析。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五四世代似乎是一個沒有性別指向、或者說不需要性別指向的概念，愛國可以輕易地成為一個超越性別的話語。即使談到女性參與五四運動，也大都在史實層面上描述女性在五四運動中做了哪些事情或者參與哪些活動。[2] 這種「添加婦女入史」無疑是更加全面地勾勒五四世代的必要做法，但卻是不足的，它容易將五四世代從歷史中割裂出來，從而凸顯其獨特性。其實，五四女性組建社團、參加遊行、對抗權威等方式並不是突然採用的策略，而是與 19 世紀末以來女權思潮和女權運動的發展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繫。這種研究方法容易將五四女性視為一個同質性的社會群體，忽略了諸如家庭背景、個人風格和公共角色等差異對這一群體所造成的分化性影響。就此，本文以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在五四時期天津的活動為中心，試圖從性別的視角重新審視五四世代，並進一步揭示其背後所蘊含的異質性。

二是將歷史拉長至 21 世紀初期，以長時段的角度來審

---

2 宋少鵬〈賦予五四運動以社會性別：女學生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一文，是一個例外，為我們提供新的視角和可能性。宋少鵬，〈賦予五四運動以社會性別：女學生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6 期，頁 60-66。

視五四世代在運動之後的瀰散和聚合。當五四運動結束後，愛國和女權這些因運動而激發的話語無法再繼續統合這三位女性的人生方向。此後，藉由五四運動延展而來的社交網絡，她們共同或分別經歷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重要歷史事件，成為社會活動家和民主人士(劉清揚)、為中共事業犧牲的地下工作者(郭隆真)和脫離政治、一心學術的大學教授(張若名)。她們的選擇，展現了五四世代在近代歷史進程中三條不同的道路：以社會運動求解放、以政黨組織求解放和以個體努力求解放，由此豐富了我們對五四世代的認知。此後，這三位女性散逸的人生軌跡，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因中共執政而被逐漸統合起來。她們與中共的關係，不僅決定了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命運，而且也決定了其在中共歷史話語中的不同形象。但是，這種現實命運和形象塑造並非只是政黨權力的單向宰制，這三位女性及其代言者們一直與政黨組織和國家權力進行各種磋商，既有迎合與妥協，也有修正與拒絕。其中，五四運動又因其在中共話語中被讚譽性地認定為是一場愛國的、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運動，繼而成為這些女性及其代言者們獲取話語權的槓桿性節點。就此而言，五四世代或許起源於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但在此之後，它卻成為一種可被靈活挪用的身分，或隱或現地貫穿在這些五四女性的個體生命和形象塑造中，為我們展示近代中國女性與婚姻、家庭、事業、政黨、戰爭和國家的複雜關係。

一、性別化的政治參與：聚合在五四運動中

> 我從女師畢業已有六七年之久，在 5 月 6 日下午去母校探聽消息，恰逢舉行各班代表會議，主持會議的是發起人郭隆真同志。我隔著窗子看見她正在發言，揮舞著拳頭，慷慨激昂。她的發言不斷地引起熱烈鼓掌。郭隆真同志知道我回母校，即興奮地跑出會議室，拉我參加會議。於是我就成為學生愛國隊伍中的一員了。各班代表會議，熱烈地討論團結天津婦女進行愛國活動問題。各班女同學的代表鄧穎超、張若名、鄭季清及女師附小教員李毅韜等，都紛紛起立發言，一致響應郭隆真同志成立婦女愛國團體的倡議。[3]

劉清揚這篇發表於 1959 年的回憶錄，將我們帶回到 40 年前五四運動那個跌宕起伏的春天。如果不是因為 1919 年 5 月 4 日學生運動的爆發，劉清揚、郭隆真、張若名、鄧穎超(1904-1992)、鄭季清(1897-1962)、李毅韜(1896-1939)這些人（以及其他許多在此未能提及的女性），或許會按照她們的既定道路，作為現代女子教育的受益者。在完成學業離校後，她們成為女教師、女醫生、女記者、女律師、女職員甚或家庭主婦，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但是，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得這些女性的人生軌跡發生極大的轉折，她們彙集在一起，組織集會、創立社團、參加遊行、抗議政府，甚至屢次出入監牢，由此成為「五四世代」的重要組成部分。

---

3 劉清揚，〈覺醒了的天津人民〉，收入中國青年社編輯，《光輝的五四》（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頁 114。

1919 年因五四運動相聚在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以下統稱「女師」) 的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三人，可以說是伴隨著 20 世紀女學常規化而成長起來的女學生典型。她們均出生在晚清開明士紳或商人家中。晚清最後十年，正是國人自辦女學的繁榮時期，尤其是 1907 年隨著女學被納入官方教育體系後，儘管圍繞女學仍有各種爭議，但去學校接受教育已經不再像第一代女學生上學那樣被視為驚世駭俗之事了。因此，三人都接受了一些學校教育，而且據載，劉清揚和郭隆真甚至有自辦女學之舉。[4] 民國成立前後，三人又先後入女師求高等學問，成為同學或校友。

對於這群以校園而非閨閣為中心構成其知識體系和社交網絡的女性而言，學校是一個培養群體認同和自治實踐的空間。[5] 一方面，學生們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學，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形成以年級或學校為中心的同學或校友認同，逐漸取代家庭中以血緣和婚姻為核心的關係網絡。另一方面，時至民初，學生自治思潮興盛，一些女校也開始推動學生自治，成立自治會或校友會，還發行相應的刊物，這在制度層面預示女學生從群體意識轉向群體實踐的可能。以女師為

4 據劉清揚女兒劉方清回憶，劉清揚在 1914 年曾在天津創辦大通女學，但僅維持一年，便因資金不足而停止。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2。根據黃庭輝的記載，郭隆真於 1909 年在自家創辦了元城縣第一女子小學堂，後改為大名縣第一女子小學校。黃庭輝，《郭隆真》（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頁 5-8。

5 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98.

例，女師成立於 1906 年，是在全國範圍內都享譽盛名的高等女子師範學校之一，可謂女子教育之典範。[6] 早在 1916 年，女師便率先實行校務自治，建立校友會，「以敦厚前後師生之情誼、扶助本校教育之發達為目的」。[7] 校友會還刊行會刊，定期彙報校務和校友會進展，各級學生還可發表文章，或展現學業進步，或表達對具體校務以及一般教育的意見。張若名便曾在會刊上發表〈陰陽考〉（與同學張嗣婧合寫）以及〈校舍記〉等文章。[8]

以這樣的群體認同和自治實踐為基礎，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五四運動中女師學生以組織社團的方式參與這場政治運動。1919 年 5 月 6 日，距離五四運動發生不過兩日，女師學生便在校內召開會議，討論成立婦女組織、支援北京學生的可能性。5 月 25 日，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成員主要由女師和天津其他各女校學生組成，同時也吸收了一些女教師、女記者等職業婦女，甚至還有一些家庭主婦。[9] 劉清揚

6 Sarah Coles McElroy, "Forging a New Role for Women: Zhili First Women's Normal School and the Growth of Women's Education in China, 1901-21," in Glen Peterson, Ruth Hayhoe, and Yongling Lu, eds., *Educ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p. 348-374.

7 〈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新章〉，《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堂校友會彙刊》（天津），期 2(1916)，本會叢錄，頁 1。

8 這兩篇短文被收入楊在道編，《張若名研究資料》（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5），頁 1-4。

9 王貞儒，〈對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幾點回憶〉，收入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四運動在天津》編輯組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頁 787-788。但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特意聲明，不接受妾和妓女。該組織指出，此舉並

任同志會會長，張若名是評議部部長。隨著五四運動的擴大，女界愛國同志會於是年 7 月成立講演隊，由郭隆真、鄧穎超等負責。[10] 其中，評議部是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領導機構，主要負責女界愛國同志會內部集體決策，偏重討論和決議，而演講部則負責推動女性走上街頭以及走進家庭進行公開演講，偏重社會實踐。可以說，從 1919 年 5 月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至 12 月聯合男女學生的天津新學生聯合會成立期間，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為天津最重要的女性參與五四運動的團體。

女界愛國同志會是一個性別意識相當自覺的女性團體。五四運動爆發後，天津先是於 5 月 7 日成立了天津學生臨時聯合會，後於 14 日正式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學聯）。[11] 但是，此處的「學校」和「學生」不包括女校和女學生。這並非是學聯無視女校，而是自晚清以來，男女校學生便多以「學界」和「女界」為名，各自愛國。學界強調作為學生的非性別身分去參與政治，而女性則

非是歧視妾和妓女，而是當下要以政治運動為重，如果允許妾和妓女這些「可憐人」進入「女界」，那麼運動的目標就會轉向社會改革，無疑會偏離女界愛國同志會之既定政治目標。〈女界同志會開會〉，《益世報》（天津），1919 年 8 月 11 日，第 3 版；〈女界同志會宣言〉，《益世報》（天津），1919 年 8 月 13 日，第 3 版。後來《益世報》上發諧文，諷刺女界愛國同志會這一決定。無賴，〈全國如夫人上女界同志會抗議書〉，《益世報》（天津），1919 年 9 月 4 日，第 10 版。

10 馬惠卿，〈五四運動在天津〉，《近代史資料》，1958 年第 2 期，頁 85-86。

11 〈學生聯合會開成立大會〉，《益世報》（天津），1919 年 5 月 16 日，第 6 版。

更多將性別視為一種自然性的認同標準，藉性別身分獲取參與政治的合法性。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女師學生對學聯這種無性別指向並無異議，而是決定以成立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方式，用明確的「女界」身分踐行其愛國目標：

> 蓋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際茲危亟之秋，焉有袖手之舉？我女界亦國民份子，豈能不盡其衛國責任？縱使起舞無劍，何難昧旦司雞？此愛國同志會所以思喚醒我無量數無知識之女同胞，使人人皆有國家思想、國家責任也。直以自勵其身，兼以教其子女，苟能普及全國，人人如是，則異日者或不致再蒙今日之強權欺淩，不致再現今日之賣國孽種，而愛國同志之天職于以盡矣！[12]

女界愛國同志會這種「我女界亦國民份子，豈能不盡其衛國責任？」的宣言，與晚清在女權思潮影響下所形成的「女國民」話語有一脈相承之意，都強調女性作為「國民份子」，與男性一起同盡愛國之責任。[13] 不僅是宣言，更重要的是，天津女界在整個五四參政實踐的過程中，也多有晚清印記，一直採取主動自覺的性別立場，將女性嵌入攸關國家民族命運的政治運動中，由此強調自己參與政治的合法性。和晚清不同的是，五四時期女性參與政治運動更多的是依託於女校和女學生為穩定核心群體的團體組織（如女界愛國同志會），這從側面也可見民初女學常規化之影響。

---

12 〈女界愛國同志會召集會員啟〉，《益世報》（天津），1919 年 6 月 22 日，第 6 版。

13 鄭永福、呂美頤，〈關於近代中國「女國民」觀念的歷史考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頁 58-63。

在採取這種女性主動加入政治運動的策略時，女界非常注重儀式上之合法性。1919 年 6 月中旬，當時天津紳界、商界、學界、報界等群體決定成立天津各界聯合會，以便更好地融合社會各界力量，推進政治運動。最初，在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立預備會上，女界並無代表參加。6 月 18 日天津各界聯合會正式成立時，女界必須儀式性地加入「各界」，並獲得承認。「天津紳、商、學、教、報各界代表於十八日下午三時假天津總商會內開成立大會，......公推彭一山為臨時主席。（回教與女界代表因加入未經大會通過，是以列於旁聽席）主席報告女界與回教函請加入本會，眾贊成，復宣佈該兩代表入席」。[14] 這種形式上的認可非常重要，它合理化了日後女界作為各界之一對政治運動的參與。當天津各界聯合會於 6 月底開會時，提議推定赴京請願八位代表，一開始是沒有女界代表的，但劉清揚作為女界愛國同志會會長，「提議女界亦應派代表同晉京請願，藉資聯絡北京之女界」，最終「由評議會通過，女界追派二人，為劉清揚張若名兩女士」。[15]

性別化的政治參與不僅表現在組織社團、赴京請願等合法形式中（儘管有時會以衝突結束），有時也會形成與政府權威直接對抗的「非法」形式。五四世代一個很重要的群體特點便是很多人都有過坐牢的經歷，尤其是年輕學生多將自己視為對抗無能政府的正義群體，經常用入獄——甚至主動請求入獄——的方式來強化這種正義自信，此即 Lewis S.

---

14 〈國民第一步勝利後之所聞〉，《益世報》（天津），1919 年 6 月 19 日，第 2 版。

15 〈山東問題續訊〉，《申報》（上海），1919 年 6 月 29 日，第 6 版。

Feuer 所言的作為群體認同的重要標誌——「代際犧牲」(generational martyrdom)。[16] 作為五四世代的組成部分，女界亦不例外。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在五四運動期間都坐過牢。以郭隆真為例，整個五四期間，郭隆真共三次入獄，尤其以第三次入獄時間最長，有半年之久。1920 年 1 月，郭隆真和張若名因魁發成事件 [17] 與周恩來(1898-1976)、于方舟兩位男學生（還有其他二十多位各界人士）一起被捕入獄，直到 7 月份才被釋放。原本帶有罪罰意義的監禁，在愛國名義下，反而成為一種自我證明的歷練方式。這些入獄的女性經常對監牢投射一種樂觀的想像，好像牢房生涯越艱苦，越能證明其愛國之真誠。在入獄時，張若名就記載到，「上下左右一看，才知是一間很破的房子，地上的土也有一錢多厚，這種景象雖然不好，但是我們能嘗到這監獄的滋味！（隆真卻已是第三次了）精神很是快樂的。」[18]

在五四世代的政治實踐中，拘禁並不是自由的喪失。恰恰相反，它是一種通過自發的組織性生活模式、與政府權威

---

16 Lewis S. Feuer,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s: 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s* (New York & London: Basic Books, 1969), p. 27.

17 魁發成是當時天津一個中日合辦的商店。1920 年 1 月，有學生發現該店隱藏日貨，遂將這些貨物沒收。這引起魁發成和學生之間的衝突，並有一些日本人介入。後來衝突升級，警察出面逮捕了參與其中的社會人士和部分學生。

18 〈張若名的營務處一段日記〉，是周恩來〈警廳拘留記〉的一部分，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上冊，頁 13。

不斷進行鬥爭的方式。[19] 其中，性別便是一個被拘者和政府權威討價還價的重要內容。例如 1920 年 1 月，當郭隆真、張若名、周恩來和于方舟等學生和其他二十多位各界人士因不同罪名入獄後，營務處將男女分開監禁。入獄期間，張若名和郭隆真不斷與官方交涉，為自己爭取更多權益。例如在等候三天不見審訊後，她們請求見主管的白大人，要求他轉達上級官員，儘早開庭。後來不見回覆，「下午我們又寫了一個條子要求過堂審問，限二十四小時答覆」。白大人出面讓張、郭兩位「先生」們忍耐，二人又提出要看書報的要求，白大人送來《列國》、《三國演義》各一部。[20] 後來，張、郭二人試圖與司法科長對話，司法科長卻因二人女學生身分而拒絕，「他同兩人說了句：『你們女學生們，我同你們說什麼話。』便走了」。張、郭二人對此十分憤怒，「致函質問司法科長，何以這樣蔑視女子人格」。[21] 上述交涉可以看出，張、郭二人將自己視為與男性被拘者一樣的愛國者，以女子獨立人格為基礎，向政府權威爭取權益。

弔詭的是，男性被拘者多以一種保護者和代言者的姿態來為女性爭取權益。入獄期間，郭隆真、張若名先後生病，因為男女隔離監禁，被拘的男代表們探望她們頗為不易。這

19 根據周恩來記述，這二十多位男代表在地方檢察廳入獄期間，組織豐富的群體活動，如讀書、讀報、學習、運動、演講、排練新劇、討論問題、過生日、過節等，並與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等官員進行交涉，爭取各種權益。周恩來，〈檢廳日錄〉，《五四愛國運動》，上冊，頁 48-127，引文在頁 73。

20 〈張若名的營務處一段日記〉，《五四愛國運動》，上冊，頁 14。

21 周恩來，〈警廳拘留記〉，《五四愛國運動》，上冊，頁 39-40。

些男代表後來與檢廳所長進行談判，要求優待女代表。[22] 時至 6 月夏至，男代表們又向所長交涉，請准郭隆真和張若名過來男代表這邊過節。最後交涉了好幾次，二人方得以成行。

1920 年 7 月判決時，政府亦因性別做出不同的判刑。張若名、郭隆真、周恩來、于方舟四人都以騷擾罪名被起訴，但是兩位男性被判五等有期徒刑二月，而張若名和郭隆真則「系屬婦女」，只判罰金六十元。[23] 張、郭二人是否挫敗於因性別而判刑不同的結果，便無從知曉了。

Robert Wohl 曾經指出，一代人能形成代際意識，其實是需要一些共同的認知框架。這種認知框架常常源自一些諸如戰爭、革命或經濟危機等重要歷史事件，它們往往會使經歷事件的群體產生一種與過去的斷裂，從而形成代際的邊界。[24] 對每一位五四運動的參與者而言，五四的爆發就是這樣一種認知框架。愛國浪潮成為裹挾著個體前進的主旋律，大家一起遊行、集會、請願，甚至一起坐牢。原本在校園中所形成的群體意識和自治實踐，因愛國而合理化地延續到了公共的政治領域，構成五四世代共同認知和記憶。對參與其中的女性而言，她們在愛國浪潮中主動將性別嵌入主旋律，或者對她們來說，性別化的自我表現本身就是一種參與愛國的政治模式。但是，對這些女性而言，是否在性別之外再無其他？答案是否定的。在五四洶湧澎湃的政治風潮下，其實

22 周恩來，〈檢廳日錄〉，《五四愛國運動》，上冊，頁 73。

23 周恩來，〈檢廳日錄〉，《五四愛國運動》，上冊，頁 124。

24 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10.轉引自 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p. 13.

暗藏著很多重要的差異，它們雖不顯於表面，卻導致五四世代這種看似整體之下的分化。以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為例，這三位女性雖都是五四時期活躍於天津女界的重要人物，但是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家庭背景差異。郭隆真來自河北省大名縣金灘鎮一個回族士紳家庭，張若名則出生於河北省清苑縣溫仁村。[25] 據黃庭輝的研究，郭隆真因無學可上，在父親的支持下於 1909 年創辦一所新式女學，並自任教員。1912 年到城裡高小念書，1913 年被選入女師讀書。[26] 張若名則是因伯父在天津，得機會來天津讀小學，後於 1916 年考入女師。[27] 對這兩位女性而言，來女師讀書，是一個離開村鎮的原生家鄉環境、進入都市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在天津，她們除了同學、校友的社交網絡外，並無太多家庭的支援。

劉清揚則和郭、張二人不同。劉清揚來自天津當地一個

---

25 據曾與郭隆真、張若名在法國同學的女作家蘇雪林回憶，郭、張二人的出身，對她們的風格影響很大。張若名和郭隆真「都是河北省人，大約都出身農村，雖比我早到法國二年，還脫不掉那份北方農村過於濃厚的土氣。」蘇雪林，〈留法勤工儉學史的一頁（上）──我與共產主義初次的接觸〉，《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臺南：財團法人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2006 年初版，2011 年再版），冊 1，頁 30。

26 黃庭輝，《郭隆真》，頁 5-6、8。蘇雪林則提供另外一幅有關郭隆真的成長圖景。據蘇雪林言，郭隆真從小和一位姑母讀過一些書，父親是煙鬼、母親去世早，父親再娶後，郭隆真很受繼母虐待。郭隆真在 16 歲時，被繼母嫁了出去。但是丈夫對她亦是各種虐待。郭隆真最後得姑母相助，跑到天津，入工廠做工，積蓄了一些錢，才開始讀書。蘇雪林，〈留法勤工儉學史的一頁（上）──我與共產主義初次的接觸〉，《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冊 1，頁 32。

27 〈張若名生平〉，《張若名研究資料》，頁 63。

頗有影響力的回族家庭，其兄長劉孟揚（伯年，1877-1943）、劉乃揚（鐵菴）自晚清起便活躍於天津報界和政界。長兄劉孟揚曾任天津《大公報》主筆，於 1905 年創辦《商報》、《民興報》，民國成立後又創辦《白話晨報》、《白話午報》、《白話晚報》等報紙。劉孟揚還先後擔任天津警察廳勤務督察長兼工巡捐務處處長、直隸省磁縣及永年縣知事等職。[28] 三哥劉乃揚在五四運動爆發時，則是北京《國強報》的社長。[29] 這樣的家庭背景，對劉清揚在政治運動中的形象呈現，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劉清揚是五四運動中為數不多出現國家和家庭交互論述的女性，其家庭成員經常閃現在劉清揚的愛國活動中。例如 1919 年 8 月劉清揚進京請願被捕，當時警廳處長與劉清揚約談，希望她放棄初衷。據《益世報》報導，劉清揚回以「我此番是奉母命救國，且男女同為國民，理應與男界同受甘苦」等語，拒絕這位處長的要求。因警廳處長與劉乃揚相識，便讓劉乃揚來勸。劉清揚又說，「我們女界此是初次在社會上作事，絕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即或死，我們亦死在頭裡。……家兄雖來，想亦不願令我偷安於一時而作一女界萬世之罪人也。」再次拒絕警廳處長的請求。[30] 是年 11 月，天津《時事紀實報》以〈好一對愛國鴛鴦〉為題，

---

28 見「劉孟揚」條，高文德編，《中國少數民族史大辭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頁 864；朱昌平、吳建偉編，《中國回族文學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頁 570-580。

29 馬惠卿，〈五四運動在天津〉，《近代史資料》，1958 年第 2 期，頁 91。

30 〈劉清揚之百折不回〉，《益世報》（天津），1919 年 8 月 29 日，第 3 版。

炮製劉清揚和馬駿(1895-1928)這兩位學生領袖的愛情緋聞，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1873-1944)不僅飭令《時事紀實報》停刊，又「以劉清揚系劉孟揚之妹，恐劉君繼起為難，聞已特派某員赴磁縣公署向劉君道歉」。[31]

除了家庭背景和社會人脈外，劉、郭、張三人參與五四運動的風格和方式也有很大差異。劉清揚是天津人，年齡較長、資歷較深（劉清揚曾參加過同盟會，且當郭、張二人還在女師就讀時，劉已是嚴氏女學的教師），尤善演講，所以，她在五四運動中更多表現出一種檯面女界領袖的形象。曾與其一起奮鬥的諶小岑(1897-1992)回憶到，「我發覺她當選天津第一個婦女愛國團體的領導人並不是偶然的。......她是天津人。她口若懸河，在會議中所發表的意見都是站在當時的愛國運動的最前線的」。[32] 劉清揚不僅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會長，而且在各種大型集會上，劉清揚都經常擔任主席一職。日後，還代表天津女界，南下上海，整日忙碌，促成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成立，自己也高票當選該聯合會的理事。[33] 此後，劉清揚繼續南下，到南京、廣州甚至南洋，進行各種宣講、募捐和調查。

可以說，整個五四運動見證了劉清揚從一個地方女界領

---

31 〈楊以德為劉孟揚道歉〉，《益世報》（天津），1919 年 11 月 16 日，第 10 版。

32 諶小岑，〈覺悟社及其成員〉，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輯 15，頁 177。

33 〈全國各界聯合會選舉理事〉，《申報》（上海），1919 年 11 月 15 日，第 10 版。

袖轉變為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社會運動領袖。相較而言，張若名和郭隆真並沒有進入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網絡中。五四運動期間，張若名偶爾擔任大型集會主席，郭隆真則完全沒有這樣的經歷。[34] 郭、張二人大都活躍在天津，偶爾去北京向政府請願，但並沒有前往其他城市（儘管有些請願議題不限於天津而是全國的或其他省的）。因此，二人更像是地方性參與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

或許是因為郭隆真和張若名一同坐牢長達六個月之久，二人關係非常密切，但是二人風格也有不同。具體來說，張若名更擅長決策和寫文，郭隆真更偏重實踐和行動。張若名曾任女界愛國同志會評議部部長，1919 年 12 月新學聯成立後，張若名又擔任職位相當高的評議會委員長，[35] 評議會（部）向來是各類五四社團負責領導、決策和執行的核心機構。在寫作方面，五四之前張若名已在《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會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即前面所提到的〈陰陽考〉和〈校舍記〉）。1919 年 9 月，當女界愛國同志會和天津學聯的二十名骨幹又成立新社團覺悟社時，張若名還曾在社刊《覺悟》上發表長文〈急先鋒的女子〉，相當全面地論述了女性解放的困境、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詳後）。[36] 郭隆真和張若名於 1920 年一起坐牢時，張若名還

34 據筆者所見，在 1919 年 12 月新學聯成立時，張若名曾擔任成立大會主席。這應是張若名擔任的最高規格的會議。〈天津新學生會成立大會〉，《益世報》（天津），1919 年 12 月 11 日，第 3 版。

35 〈天津新學生會成立大會〉，《益世報》（天津），1919 年 12 月 11 日，第 3 版。

36 三六，〈「急先鋒」的女子〉，《覺悟》（天津），期 1（1920 年 1

留下一段日記，記述二人獄中生活。筆者未能發現整個五四期間郭隆真所留下的文字。但是，郭隆真卻是一個行動派。如前所述，她在五四運動剛爆發時便號召女師同學要成立婦女組織（即後來的女界愛國同志會）。據學聯及覺悟社成員諶小岑的回憶，覺悟社的成立也與郭隆真率先提出要更緊密地聯合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這一意見有關。[37] 在整個運動期間，郭隆真還負責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街頭演講。不僅在社團事務中，郭隆真在個人風格方面也相當激進。據諶小岑回憶，在 1920 年 8 月郭隆真出獄後，她剪了一個男式平頭。當時，女子剪髮在社會中仍是備受爭議的事情，更不用說像郭隆真這樣剪成男式髮型。「剪一個男式平頭，我相信這在當時全國的兩億多婦女中，郭大姐是僅有的一個。」[38]

覺悟社部分成員合影

月），頁 1-11。

37 諶小岑，〈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天津「覺悟社」〉，《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頁 755。

38 諶小岑，〈覺悟社及其成員〉，《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15，頁 176-177。

資料來源：程世剛，〈覺悟社全家福〉，《黨史博覽》，2008 年第 3 期，頁 11。

上圖應是諶小岑在回憶中提到的照片。郭隆真站在第二排右三的位置，從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確實留了一個男式頭型，沒有女式瀏海。事實上，如果不是其上衣仍可看出是女式短袖服裝，郭隆真頗有些雌雄莫辨的氣質。

這張照片不僅使郭隆真的形象更加直觀，同時也可以一窺劉清揚的風格。劉清揚坐在第一排右二的位置，在照片裡的六位女性中，其肢體姿勢最為豐富。她交叉雙臂，身體稍向左，甚至還蹺著腿，姿態頗為張揚。這種身體語言，使得劉清揚對其左邊的女性（鄧穎超）形成擠壓，同時也使她與右邊的男性保持一定距離。可以說，儘管劉清揚在這張合照中並不居中，但無疑會讓大家很快注意到她，就像現實中所呈現出的檯面女界領袖形象一樣。

1920 年 7 月，郭隆真、張若名、周恩來等二十多人出獄，這也意味著天津五四運動高潮的結束。此後，或許是要躲避政府壓力，或是為了開闊眼界，不到半年的時間，郭隆真、張若名、周恩來和劉清揚四人都先後藉留法勤工儉學之機，離開天津，漂洋過海到法國，開始一段新的人生。原先通過政治運動所表達的國族主義和女權主義，逐漸被異國他鄉物質匱乏、政黨競爭等新的話語和實際情境所取代。這三位女性原本隱而不顯的差異逐漸浮出水面，「五四世代」開始呈現出不同的人生取向。

二、漸行漸遠：散逸在歐洲土地上

如果說五四運動將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的生命軌跡聯繫在一起，那麼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便是他們漸行漸遠的開始。廣泛來講，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始於民國初年李石曾(1881-1973)、吳稚暉(1865-1953)和蔡元培(1868-1940)等人提倡的目的是為了吸引中國青年到法國，通過半工半讀的方式，增進學識、瞭解歐美。最初幾年進展頗為順利，後因一戰爆發和國內政局混亂有所中斷。1919 年前後受俄國十月革命、勞工神聖、工讀主義及五四運動等影響，[39] 該運動又掀起高潮。最後，整個運動大約有 1600 名學生來到法國。

但是，在法國的生活並非像很多學生在國內設想的那樣美好。他們面臨著技術、語言、體力、費用不足等問題，很難找到工作。最後，許多學生陷入極大的物質困頓，只能愈發依附華法教育會，獲得最低生活補助，有時甚至長期滯留在華僑協社（當時在法成立的各中國團體的聚集地），每天靠麵包、開水度日。[40] 處於困境中的中國學生依舊延續了五四風格，在 1921 年發動了 3 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表達政治訴求。但是，在 10 月份，大約 100 名中國學生被遣送回國，這標誌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消亡。[41] 可以說，當 1920

39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6-92.

40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68-69。

41 有關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參見張允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森時彥著，史會來、尚信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小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Paul Bailey, “The

年年底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三人來到法國時，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正處於由盛轉衰的時刻。物質生活的貧困、人生理想的挫敗、意識形態的紛爭以及政黨組織的介入，塑造著這些勤工儉學生的人生軌跡。

儘管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三人都是藉留法勤工儉學之機離開中國，然而，三人的人生軌跡自登船那日起，便開始走向不同的方向。這種逸散，看似毫無規律，但卻有跡可循。郭隆真和張若名於 1920 年 11 月 7 日和周恩來乘坐波爾多斯號(Porthos)從上海出發，12 月 13 日抵達馬賽（周恩來中途下船，在新加坡等候即將到來的蔡元培等人）。郭、張二人的姓名被簡單列於《申報》「十五屆赴法學生姓名錄」的最後「女儉學生」之列。[42] 11 月 24 日，劉清揚從上海與蔡元培一起乘坐高爾地埃號(Cordillere)出發前往法國，媒體呈現出來的劉清揚是一位可以緊列於蔡元培之後的學生，「蔡孑民等及學生劉清揚等乘高爾地埃號輪船赴法」。[43] 出發前，全國學生聯合會還特意為劉清揚這位學生聯合會理事及全國各界聯合會理事召開歡送會，期待「劉女士將來為吾國女界前途辟一新紀元」。[44] 12 月 27 日，蔡元培、劉清揚、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115 (September 1988), pp. 441-461；鮮于浩，《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史稿》（成都：巴蜀書社，1994）。

42 去法國的學生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儉學生，這意味著學生手頭有足夠的錢，可以先讀後工。如果是勤工生的話，則說明該學生財力不足，極有可能會先工後讀或者半工半讀。

43 〈民國九年上海大事記（五）〉，《申報》（上海），1920 年 12 月 31 日，第 10 版。

44 〈全國學生會歡送劉清揚女士〉，《申報》（上海），1920 年 11 月

周恩來等人抵達馬賽，繼而前往里昂，與郭隆真和張若名見面。30 日，郭、張二人被另一位資深勤工儉學生盛成(1899-1996)帶往法國南部蒙白里葉(Montpellier)這個偏隅一方的小鎮，[45] 周恩來、劉清揚等人則出發前往巴黎，三人就此分別。

對劉清揚而言，乘坐高爾地埃號這一個多月的時光中，不僅可與蔡元培這位教育界領軍人物頻繁接觸，更重要的是，劉清揚在船上與張申府(1893-1986)建立了戀愛關係。張申府是一個思想豐富的年輕學者，從北大畢業後便留校教授數學和邏輯學。他十分信仰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但同時對共產主義理論也感興趣。1918 年，他與私交甚好的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一起創辦《每週評論》，繼而在 1920 年 10 月參與創辦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張申府此次前往法國，是應吳稚暉等人籌備成立里昂中法大學之邀，以每月 800 法郎的薪資聘請前來授課。張申府以「北京大學校長秘書」的身分，同蔡元培一起坐一等艙前往里昂。[46] 我們並不知道劉清揚坐幾等艙，考慮到劉清揚的家庭背景以及她作為知名的女界領袖的身分，或許也是乘坐一等艙，而當時大部分的留法勤工儉學生（如郭

---

23 日，第 10 版。

45 盛成，〈序〉，收入張若名著、楊在道編，《紀德的態度》（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頁 1-2。

46 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1979 年 9 月 17 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冊 2，頁 222；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p. 104.

隆真和張若名二人）多是乘坐三等或四等艙。

張申府在 1920 年便認識了劉清揚這位年輕但卻聲名漸起的女界領袖。[47] 時隔半年，二人又在前往他鄉的船上相遇，他們很快地便確立了戀愛關係。[48] 下船後，張申府和劉清揚在 1921 年 1 月開始同居。1921 年 2 月，張申府在巴黎成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並將劉清揚納入該小組，此後，張、劉二人又發展周恩來為成員。[49] 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張申府身兼里昂中法大學教授、精通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創始人和領導人等多種角色。與張申府在公共事務和政治領域的活躍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劉清揚逐漸退隱於家居生活。此時的劉清揚，不再是五四時期奔走全國的女界領袖，而更像眷戀著愛人的家庭主婦。當時張申府每月薪水有 800 法郎，足以讓張、劉二人租上一套寬敞的公寓、過著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劉清揚精心照顧張申府的起居飲食。不久，劉清揚懷孕，並於 1921 年年底生下一子。這兩個人的世界與那些門外仍然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勤工儉學生，形成鮮明對比。

1922 年年初，張申府為了聲援勤工儉學生，便辭去中法大學教職。眼見在巴黎生活日益艱難，張申府和劉清揚決定

---

47 張申府，《所憶：張申府憶舊文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頁 14-15；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pp. 63-64.

48 〈張申府之熱戀趣史〉，《時代生活》（天津），卷 4 期 3（1936 年 4 月），頁 106；王獨清，《我在歐洲的生活》（上海：光華書局，1936），頁 29-30。

49 張申府，《所憶：張申府憶舊文選》，頁 22。

搬去生活費用較為低廉的德國，但是二人並未將孩子帶去，而是把他留在里昂一個奶媽家中。[50] 同年 6 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後改名為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團的性質），為了整合各國支部，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於是年冬天成立，張申府任支部書記。

但是，劉清揚這種對伴侶滿心順從的家庭主婦形象，似乎更多地是 1980 年代仍掌握敘述權力的張申府對二人異國生活的一種玫瑰色回憶。事實上，通過為數不多的史料仍能看到在歐洲的劉清揚並未完全從政治退出，多少還是保留作為五四運動檯面女界領袖、參與政治事務的風格。1923 年 5 月，發生震驚中外的山東臨城劫車案，西方列強主張對中國鐵路進行管制。7 月，身在歐洲的曾琦(1892-1951)（也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重要發起者之一）在巴黎社會博物館召開旅法各團體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想要抗議西方主張，大約有四百人與會。根據李璜的回憶，正當大會要宣佈結束時，

> 乃忽由女共黨劉清揚跑上主席臺去，大講其國際共產主義，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非聯合蘇俄，不足以言革命救國等，一講便是半點鐘，會眾莫名其妙，大不耐煩，噓聲四起；主席何魯之請她停止時，會場中便起了喊打之聲，石頭擲向臺上亂拋，會場秩序大亂。[51]

無獨有偶，在莫斯科學習的中共黨員彭述之(1895-1983)也曾負面地評價劉清揚。1923 年底張申府、劉清揚離開德

---

50 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pp. 1-2, 78.

51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 95。

國、途經蘇聯回到中國時，彭述之認為，劉清揚「在柏林時對待學習並不那麼認真嚴肅，她的一般文化修養和政治水準都是很低的，她有強烈的虛榮心，念念不忘的是革命以後的安樂生活」。不久，彭述之與張太雷(1898-1927)、劉清揚等人以中共代表身分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並一起回國，經過一個多月的相處，彭述之又評價道，「我還發現她滔滔不絕地胡說八道，其唯一目的是誇耀自己，提高她的身價」。[52] 當然，李、彭二人的評價自有其立場，一位是不喜中共的中國青年黨的創始人，另一位是在中共內部被視為反動派托派首領、後被中共開除出黨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二人在回憶錄裡對劉清揚追溯性的負面評價，多少承載了他們對中共的態度，有其意識形態相爭之痕跡。但是，從這幾段回憶中，至少可以看到劉清揚並不像張申府所說那樣，安於賢妻良母的生活，而是試圖在一些重要的公領域場合（如愛國集會、政黨會議）中努力表現其原來那種侃侃而談、強勢主導的領導風格。如此之努力，以致有時會有過猶不及之效果（尤其是在男性眼中）。可以說，劉清揚仍要緊緊抓住其五四榮光。那段輝煌的過去，一直是她自己所認可的、值得炫耀的身價。

相較之下，郭隆真和張若名過著與劉清揚大不相同的生活。首先體現在郭、張二人經濟困頓。據張若名長子楊在道的回憶，出國前張若名已與家庭脫離關係，身無分文。在郭、張二人出國時，為她們做辯護的律師劉崇佑(1877-1941)

52 彭述之口述，程映湘、高達樂(Clande Cadart)編撰，周任新、葉向陽翻譯，《彭述之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頁 352-353。

捐助她們 300 元。另外，在周恩來等人介紹與劉清揚的父親擔保下，張若名向天津學聯借了由學聯保管的、當時懲罰買賣日貨的商號萬德成罰款中的 1,000 元。[53] 同時，張若名在出國前還被北京《晨報》聘為特約通訊員，應也有一些稿費收入。據蘇雪林回憶，郭隆真則得到其姑母的一些資助。[54] 無論如何，若按照當時中國留學生在巴黎一個月消費僅需 40 元（折合 500-600 法郎左右）的水準，[55] 這些錢大約可以支持郭、張二人在蒙白里葉生活半年左右。

蒙白里葉固然生活消費低，工作、教育機會相對也少，二人自然不能只靠著手中的錢來過活。不久，郭隆真和張若名先是遷往法國中部布盧瓦(Blois)，後又搬到巴黎。自 1921 年下半年起，二人經濟境況惡化。當時，張若名、郭隆真已考入法國德龍省立女高校，學費成為很大的開支，二人生活捉襟見肘，很受法國同學歧視。[56] 是年年底，北京《時事新報》刊登郭隆真「寄來血書名片一張，系斷指所書者」。編輯還特意指出，「惟函中文字，多雜亂無章者，想系郭女士困苦之余，精神大受刺激所致」。在這封信中，郭隆真描述勤工儉學生在他鄉的困境，並指出女生在法工學困苦狀況較

53 〈張若名生平〉，《張若名研究資料》，頁 74。也可見劉清揚，〈對「覺悟社」等問題的解答〉，《「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冊 2，頁 231。

54 蘇雪林，〈留法勤工儉學史的一頁（上）〉，《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冊 1，頁 32。

55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 46。

56 蘇雪林，〈留法勤工儉學史的一頁（上）〉，《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冊 1，頁 30。

男生尤甚。郭隆真還提到各省補助費的問題，當時來自河南、山西、四川、陝西等地的男女學生，可以按其在國內教育資格（如中學（或未卒業）以至高小不等），申請本省補助經費。但郭隆真「尤不敢居於非分偕食之地，以保持青年之潔白」，並未申請這筆資助。[57]

此後，郭隆真、張若名不斷尋找工作機會。1922 年，二人在巴黎近郊一個雲母片廠找到工作。不久，因工廠環境惡劣，張若名不斷生病，最後只好退出工作，由郭隆真負擔兩個人的生活。1923 年年底，二人實在入不敷出，只好向直隸省申請補助。但是，直隸卻以「年來度支枯竭」以及「本省向無津貼自費生之例」為由，拒絕資助。[58] 此時，幸賴劉清揚四處奔走，最後得劉廷選出資相助，使二人生活再維持一段時間。[59]

可以說，在法國這幾年的生活，郭隆真和張若名就像其他大部分勤工儉學生一樣為經濟所困，在求學和做工之間不停擺蕩。或許正是如此，郭、張二人和其他很多學生一樣，在政治上愈加激進，逐漸向中共靠近。1922 年，郭隆真、張若名加入前述由周恩來等人創立的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分別有了新的名字郭林一、張一峰。不久，張若名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二人加入少共的選擇，或許與周恩來私

57 〈留法女生郭隆真之血書〉，《時事新報》（上海），1921 年 12 月 22 日，第 2 版。

58 〈留法女學生亦請津貼〉，《大公報》（天津），1923 年 11 月 3 日，第 6 版。

59 〈留法學生之窘困狀況，熱心助款之可欽〉，《大公報》（天津），1923 年 12 月 11 日，第 6 版。

交甚好有關，也或許是因為二人以前在天津參加學運、並初步瞭解馬克思主義的經歷有關，也有可能是因為此時共產國際開始資助這些在歐洲土地上、因生活困苦而不斷在政治上激進的年輕人。[60] 但無論如何，自此郭隆真和張若名的生命軌跡便逐漸與政黨組織產生了密切關係。就像幾年前她們成為覺悟社成員而有新名字一樣（郭隆真名為「石衫」，張若名名為「衫陸」），在成為新興政黨的個體份子時，又有了全新的名字。命名成為她們與不同的現代社團、政黨建立聯繫和表達認同的重要象徵。1923 年，郭、張二人搬到里昂，並積極參與當時少共（此時已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華工中的動員工作。次年，隨著國內國共兩黨聯合，此一趨勢亦延展到歐洲。張若名、郭隆真也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張若名任評議部委員，郭隆真則負責婦女部。[61]

此時，二人的差異逐漸顯現出來。張若名延續自天津以來的一貫風格，是一位冷靜自持的批評者以及顧看實際的觀察者。到法國後，她在擔任《晨報》特約通訊員時所寫的文章，多以高瞻遠矚、放眼全域的角度來看當時歐洲社會情況和勤工儉學運動問題，甚至從不迴避勤工儉學生之間的對立和差異。[62] 在加入少共和國民黨後，她就像在五四時期一樣，仍擔任執行委員或者評議部議員的職責，側重對團、黨

60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頁 78-80。

61 〈旅歐中國國民黨支部成立〉，《申報》（上海），1924 年 1 月 31 日，第 7 版。

62 如張若名，〈留法儉學生之恐慌與華法教育（會）〉，《晨報》（北京），1921 年 4 月 10 日，第 6 版，4 月 12 日，第 6 版；〈留法儉學生最近之大覺悟〉，《晨報》（北京），1921 年 6 月 12 日，第 6 版。

事務進行分析、總結和決策。當張若名因健康原因退出雲母廠工作後，有更多的時間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加以其法語水平高，[63] 還在當時團內成立的共產主義研究會上扮演主講人的角色，給其他同志講授馬克思主義，其講稿最後整理為〈剩餘價值〉、〈階級鬥爭〉等長文。

相較之下，郭隆真則更傾向實踐和實際的鬥爭—這與她在五四時期的風格也多有一致。這或許與她在雲母片廠的經歷有關，也或許與她積極參與華工動員有關。正是因為長時間在工廠裡艱辛工作的經驗，郭隆真對階級鬥爭不像張若名偏重理論，反而是有更實際和實在的認識。1924 年，郭隆真發表〈法國資本家虐待中國女子〉一文。郭隆真寫文相當少（與張若名大不相同），這是其在歐洲時期留下為數不多的署名文章之一。據郭隆真記載，當時一位名叫王亞森的女士，被繼母誘拐到法國一商人家中充當下女。這家人不僅虐待王亞森長達兩年的時間，最終還將王驅逐出去，並扣押其居留證。郭隆真寫道，

> 我尤盼望大家要明白這就是資本制度的罪惡！法國資本家不知奴隸了多少法國女子，現在且奴隸及中國女子。王亞森這件事不過是法國資本家黑暗勢力下底一個發現，我們應該為已發現的王亞森謀解放，同時亦應該為[未]發現的女奴隸謀解放！[64]

---

[63] 盛成，〈序〉，頁 2。亦見蘇雪林，〈留法勤工儉學史的一頁（上）〉，《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冊 1，頁 31。

[64] 郭隆真，〈法國資本家虐待中國女子〉，原載《赤光》，期 17（1924 年 10 月 15 日），收入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冊 3，頁 58。

這種從個案上升到法國資本家奴役法中女性的論述，頗有生硬牽強之感，但也可見此時的郭隆真已經開始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階級語言來描述社會現象、反思社會問題。

對郭隆真和張若名來說，1924 年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這年 1 月 21 日，列寧逝世，法國共產黨里昂支部計畫要為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舉行追悼會，並邀請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時任青年團書記的任卓宣(1896-1990)派法語較好、理論水準較高的張若名參加。當張若名在追悼會上發言回來後，卻被法國秘密警察訊問和跟蹤，最終導致張若名逐漸退出團內工作。與此同時，同年 7 月，周恩來回國接受新的政治任務（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冬天來臨時，郭隆真又被中共選派至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65] 據楊在道回憶，郭隆真臨走之前，將曾在天津坐牢時共用的一條毯子作為臨別禮物送給張若名。[66]

對張若名來說，幾位一起同甘共苦的好友／同志都已離開歐洲（劉清揚這時也已和張申府回國），她也無法繼續參與青年團的活動。於是，張若名最終決定完全退出青年團，脫離政治，專心學業。1924 年，她憑著直隸第一女子師範的結業證書，經中國駐法總領事館驗證推薦，進入法國里昂大學讀書，1930 年秋，張若名獲得法國文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是關於法國著名作家紀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的研究。就在畢業前半年，張若名與郭隆真的同

---

65 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頁 133。

66 〈張若名生平〉，《張若名研究資料》，頁 83。

鄉（通過郭隆真介紹認識）、甫獲里昂中法大學民俗學博士學位的楊堃(1901-1998)結婚。是年 12 月，這對博士夫妻經由陸路回國，並於 1931 年 1 月初回到北京。

不過三、四年的光景，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三位原本在五四運動中一起奮鬥的女界成員，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劉清揚成為張申府的生活伴侶和政黨同志，偶爾出現在公共政治場合。郭隆真開始服膺於馬克思主義，並努力付諸實踐，成為一名實幹的共產黨員，被派往莫斯科學習。張若名則由中心走向邊緣，從最初中國共產黨黨團組織的核心成員，到完全從政治中退出，專心學術。她們的人生看似散逸，卻有跡可循，甚至可以說，這種散逸的人生，恰可見個體經驗與宏大話語之間不斷博弈和磋商。毫無疑問，政黨組織——不管是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還是國民黨——在這三位女性於歐洲的人生選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團組織，它為她們在風雨飄搖的勤工儉學運動和歐洲社會環境中提供了一種新的言說框架、社會關係和群體認同，甚至一些物質供給。由是，中共政治開始影響這些女性的實際存在。

以女性解放議題為例。1923 年年底，已回國的劉清揚與幾位五四摯友，共同創辦《婦女日報》，並邀請仍在法國的張若名、郭隆真寫稿。張若名單獨署名發表〈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一文，又和郭隆真聯合撰寫〈兩個法國朋友的信〉一文。在這兩篇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張、郭二人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解放的理論來闡釋婦女解放。第一篇文章明確指出，女性要團結一切被壓迫者，尤其

是被壓迫的民眾，從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層面，去解決國事和社會事，只有這樣，才能自然而然地解決婦女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不良，可以阻止一切進化。不推翻壓迫者，不打破私有制，婦女問題，不能得到滿意的解決」。[67] 第二篇文章則對《婦女日報》提出建議，認為無產階級婦女「第一步關頭，還是經濟問題。若能調查伊們的生活情形，而送入中產階級婦女的眼簾中，則可引導中產階級婦女對無產階級表同情，終於無產階級化」。[68]

這種階級解放高於婦女解放的觀點，與張若名寫於五四時期的〈「急先鋒」的女子〉一文所展現出來的「精英女性引導婦女解放」、「婦女解放問題僅是婦女問題」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該文指出，「女子現在應當全體解放，與黑暗勢力戰爭；但是只有少數人能作到，多數人不能實行，......要得一種好結果，這少數人必得先從本身預備，然後再推到大家身上去做」。[69] 由此可見，張、郭二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後，確實改變了之前少數代言多數的精英女權主義立場，開始自覺地使用馬克思主義闡釋框架，將階級解放置於婦女解放之上，以社會革命和經濟革命來謀求婦女的最終解放。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 1920 年代初期，儘管張、郭二人作為黨員已能運用馬克思主義重新闡釋婦女解放，但作為政

---

67 一峰，〈現代的女子以怎樣的解放為滿意〉（續），《婦女日報》（天津），1924 年 3 月 18 日，第 1 版。

68 〈兩個法國朋友的信〉，《婦女日報》（天津），1924 年 3 月 23 日，第 4 版。

69 三六，〈「急先鋒」的女子〉，《覺悟》（天津），期 1（1920 年 1 月），頁 1-11。引文在頁 4。

黨組織的中共旅歐支部，在其剛成立時，還未形成日後列寧式政黨那種嚴格規訓的特點。它更多是像 Vera Schwarcz 所說的，是一種「非正式共產主義」(informal communism)的運作方式。[70] 其中仍留有私交網絡和同鄉聯繫的痕跡，這也為這三位女性在中共黨團組織中靈活地尋求自我空間提供有利的條件。她們進入政黨的方式不同，各自選擇與政黨的距離也不同，從而導致對政黨的界定不同。對劉清揚而言，成為中共黨員是一個相當私人的選擇，是由其戀愛關係直接延展而來。因此，張申府作為愛人和作為政黨首領的角色是合一的，私領域和公領域亦是合一。這種想法從 1948 年劉清揚因張申府背離中共立場而決定離婚是一樣的邏輯(詳後)。

對郭隆真和張若名而言，她們之所以加入青年團，一方面與原來自五四延展而來的熟人網絡有直接關係，青年團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視為五四社群在異國他鄉之翻版。另一方面，青年團多少撫平她們在異地生活時求工不得、求學無力的挫敗感，提供新的選擇和出路。但在加入後，中共黨團組織的父權權威特質開始展現出來，尤其是對女性成員而言，如階級解放高於婦女解放、女性成員對男性領導的服從（例如，儘管張若名不想去參加列寧追悼會，但最終卻不得不服從書記任卓宣的命令，導致身分暴露）、或者女性黨員只能負責婦女解放工作而難以進入其他權力部門等。面對這些變化，張若名最後選擇遠離政黨組織、投身學術的方式來表達自身立場。她選擇紀德作為研究對象，或許也有藉紀德來表

70 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p. 100.

達知識分子對自由精神之嚮往和對政黨權威之反抗。紀德作品中對傳統的打破、對青年成長的描述以及對個人主義的探索，都深深吸引著張若名。因此，「張若名也對個人自由和藝術式自由之間的關係的本質有了深刻的瞭解。......她拒絕服從中共所要求的壓倒性的組織精神」。[71] 郭隆真本就是性格激進之人，加之她並沒有像劉清揚或張若名那樣有婚姻或學術為退路，[72] 唯有忠心地追隨中共黨團組織，以服從、接受權威的方式來界定自我歸屬和政治身分。[73]

由劉、郭、張三人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共黨團組織成立初期，尤其在歐洲這樣一個異域環境中，個體成員其實仍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遊走。她們遊走的方式和程度，一方面與其自五四延續而來的個人風格和私交網絡有關，另一

71 Marilyn A. Levine, "Transcending the Barriers: Zhang Ruoming and Andre Gide,"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3:3 (Spring 1990), pp. 32-53. 引文見頁 49。

72 在時人的回憶中，郭隆真的學習能力一直不強。劉清揚，〈活躍於「五四」及「北伐」時的郭隆真〉，《人物雜誌》（上海），期 4（1946 年 11 月），頁 27；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頁 167。

73 蘇雪林曾談及郭隆真確實將共產主義、十月革命內化為自己的的真心信仰（儘管蘇是以一種諷刺和批判的語調談及此點）。「那郭小姐也奇怪，法文固不通，中文程度也有限，只能勉強閱讀流行書報，談到中國古書上的事，她竟半點不知。但滿口『十月革命』、『階級鬥爭』、『勞資對立』、『布爾喬亞』、『普羅利達利亞』、『奧伏爾變』、『列寧』、『馬克斯』、『思格斯』，那些佶屈聱牙的名詞術語，她偏念得順口如流、滑溜之至。……她的確把蘇俄人為她最親愛的祖國，一提到蘇俄的革命事跡、革命偉人，她便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甚至任何事物，只須涉及蘇俄，也能引起她同樣的興奮」。蘇雪林，〈留法勤工儉學史的一頁（上）〉，《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冊 1，頁 38。

方面也與政黨本身的組織、動員模式有關。由是，個體經驗能夠千絲萬縷地穿插在政黨體制的罅隙中，繼而形成各自不同的主體性和對政黨的認同感。

三、未竟之死亡：統合在中共政治下

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被吸收為中共黨團成員後，政黨權力就一直成為她們生命中的重要存在，不管是與之貼合、迎合，還是背離。這三人中，郭隆真與中共的關係最為緊密。從歐洲回來後，郭隆真一直在北京、哈爾濱、青島等地負責中共地下動員工作。其工作性質使她在這一時期的經歷變得晦暗不明，甚至無法整理出一條清晰的時間線。大致而言，在 1925 年夏，郭隆真從蘇聯回到國內，被中共派到北京。當時北京處於張作霖統治之下。郭隆真以郭林一的名字展開工作，表面上擔任北京漫雲女校校長，負責國民黨婦女部事務，[74] 但暗中為中共工作。1927 年 3 月底、4 月初，李大釗、郭隆真等六十餘人因其中共黨員身分暴露，在北京先後被捕，後來李大釗被處死，郭隆真則被判一等有期徒刑十二年。[75] 次年年底，郭隆真出獄。

74　〈昨日北京之婦女節紀念會〉中列郭林一為漫雲女校校長身分。但是 1927 年 3 月底郭隆真被捕入獄時，則被列為漫雲女校學生，〈昨日北京之婦女節紀念會〉，《大公報》（天津），1927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營救被捕學生聲中，陳興亞與各校長談話。陳興亞允各校長之兩項要求，被捕及已釋學生之詳細報告〉，《大公報》（天津），1927 年 3 月 29 日，第 3 版。

75　〈京黨案十人處徒刑〉，《大公報》（天津），1927 年 4 月 30 日，

1929 年，郭隆真被派到中共滿洲省委哈爾濱市委工作。中共向來視東北為重要工作地區。[76] 1929 年 7 月中東路事件爆發，更是成為一個絕好的動員工人展開鬥爭的機會。當時，滿洲省委在哈爾濱三十六棚（即中東路哈爾濱總工廠）建立產業支部，並派黨員李梅五前去發動工人。李梅五是山東青島人，曾是旅法華工，也在莫斯科學習一段時間，回國後被派到三十六棚工作。為了方便李梅五的工作，劉少奇向中央請求派郭隆真來哈爾濱。據劉少奇所言，一是因為李、郭二人之間早有感情（二者或許是在法國、或許是在莫斯科相識），再加之此次因中東路事件契機，正好派郭隆真來做李梅五的家眷，方便和黨的聯繫。「老 A（即李梅五—筆者注）在不久一定會一切都不能自由，......故需大姐做他的家眷來取得聯絡。同時老 A 想會大姐已有數年的苦相思」。[77] 郭隆真和李梅五由此成為夫妻，此後，郭便一直以「大姐」的身分活躍在黨的各項工作中。

這段婚姻因政治而起，很快也因政治而亡。當時中共中央和滿洲省委決定推行「積極組織擁俄的總罷工」之策略來應對中東路事件，但是李梅五對此卻有不同意見。[78] 之後，

第 2 版。

76 〈中共滿洲省委給哈爾濱市委的指示──對「八一」工作中存在缺點的批評〉（1929 年 8 月 23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3- 1929.10)》，1988 年 12 月，內部資料，出版項不詳，頁 270。

77 〈劉少奇給滿洲省委並轉中央的信──巡視哈爾濱市委及中東路工人鬥爭情況〉（1929 年 9 月 26 日），《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3- 1929.10)》，頁 325-326。

78 〈劉少奇關於中東路工人鬥爭的總報告〉（1930 年 3 月 13 日），《東

當工人們開始自發怠工，李梅五亦無有效應對策略。而在此過程中，郭隆真則積極參加由工人成立的失業團，並認真執行中共決定。「黨差不多每次都決定建立赤色公會及工廠委員會，他們一直是怠工的。後來大姐參加一次會議之後，馬上回去就執行。......大姐和工人開會，提出工廠委員會組織的方法，工人非常贊成，說這樣辦法好極了」。[79]

郭隆真對黨的策略的認同和執行，最終導致她與李梅五之間婚姻的破裂。據郭隆真的報告，李梅五向郭隆真稱自己是反動派中央工人部部長，並說「我愛你是要你來服從我反對派。你現在怎樣？即刻表示態度，要服從就服從，不服從即刻滾出去」。甚至有一次，李梅五半夜將郭隆真趕出家門，讓其在雪地中站了兩個鐘頭。[80] 最後，中共成為這樣一段公私兼有的婚姻仲裁者。中共將李梅五定性為托洛斯基反對派，開除其黨籍，並高度評價郭隆真對黨的忠誠。「在工作上最積極在政治上又正確的是大姐，她只是少辦法，說話的技術不好，對黨的指示完全是執行的」。[81] 中東路事件後，郭隆真繼續留在東北工作。

好景不長，1930 年 4 月底，滿洲省委成員全體被捕，組織癱瘓。5 月 2 日，郭隆真和其他幾位同志以臨時委員的身

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11-1930.4)》，頁 213。

79 〈劉少奇關於中東路工人鬥爭的總報告〉(1930 年 3 月 13 日)，《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11-1930.4)》，頁 220、頁 240。

80 〈劉少奇關於中東路工人鬥爭的總報告〉(1930 年 3 月 13 日)，《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11-1930.4)》，頁 254-255。

81 〈劉少奇關於中東路工人鬥爭的總報告〉(1930 年 3 月 13 日)，《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11-1930.4)》，頁 252。

分開會，又全部被捕。在審訊過程中，郭隆真否認秘密集會，而是聲稱自己叫張黃氏，是來自青島的妓女，後來從良做妾，但又被大老婆虐待，無奈之下，只好托某某為媒，嫁於某某為妻。藉此，在場的其他幾位中共黨員便順理成章地被分別指認為媒人、寫婚書者、借錢的人和看熱鬧的人。最後，郭隆真以「背夫竊逃」的罪名被送往濟良所，後來又花了幾百元錢，賄賂警察，才得以出來。[82]

這次被捕使郭隆真無法繼續留在東北，在中共的調派下，來到山東任省委婦委書記，當時省委對其評價是「郭大姐精神雖好，但工作也很弱」。[83] 大約在 1930 年 11 月，郭隆真再次被捕。[84] 次年 4 月 5 日，郭隆真在濟南被韓復榘政府處決。據一份青島檔案資料言，「婦人姓稱為張馬氏，繼又供為張李氏」。[85] 似乎直到其被處決，韓復榘政府一直沒有發現郭隆真的真實姓名和身分。如果此言確信，那麼郭隆真終其一生姓名的不斷變化，恰好折射出其人生的幾個重要階段。原名淑善，在學校用名隆真，後在五四時期加入覺悟

82 〈中共滿洲省委給中央的報告── 關於省委被破壞及目前工作情況〉（1930 年 5 月 17 日）以及〈中共滿洲省臨委給中央的報告── 關於省委被破壞的原因、經過及其教訓〉（1930 年 5 月 23 日），《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5-1930.10)》頁 5-6、頁 26-27。

83 〈中共山東省委會議記錄：關於組織工作和黨的中心任務等問題〉（1930 年 11 月 13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編，《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北京：中央檔案館，1994），甲種本第五集(1930.7-1931.2)，頁 257。

84 〈中共山東省委關於同志被捕及經濟困難等事致中央信〉（1930 年 11 月 16 日），《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頁 274。

85 張恩棠，《回族革命女英雄郭隆真》（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1988），頁 4。

社，因抽到數字十三，便取諧音石衫，之後加入青年團及共產黨後又用名林一。最終，郭隆真卻以中國最普通的已婚女性張李氏的名字離開人世，令人不勝唏嘘。

當郭隆真奮鬥於中共的地下工作、在生死邊緣遊走時，昔日的好友張若名與丈夫楊堃雙雙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於 1931 年 1 月回到北京。張若名回國後，繼續堅持其遠離政治的決定，在北京中法學院任文學院教授，從事教書、寫作和翻譯的工作。同時，在繁忙的學術之餘，張若名生育了兩個孩子。這一段時間，應是張若名在經濟上最為富足、生活上最為愜意的時期。丈夫楊堃也在中法大學任教，夫妻二人都是教授，每月有 600 多元收入。據長子楊在道的記載，當時「家中雇了一個奶媽，一個做飯的，還有一個腳伕拉『包月』」，週末一家人還經常去公園玩耍。[86]

但是，好景不長。1937 年 7 月下旬日本佔領北京後，中法大學大部分教授南遷，留守北京的教授每人只得一半薪金。在此情況下，楊堃轉而至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張若名則一邊擔任《法文研究》的編輯，一邊仍堅持撰寫和翻譯文章。大約在 1940 年，張若名開始參加基督教活動，並在公理會教堂讓長子楊在道受洗。昔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如今卻選擇通過宗教來獲取內心的平靜。次年，燕京大學停辦，楊堃受聘到中法漢學研究所工作。1944 年研究所停辦，《法文研究》亦停刊，夫妻二人便隱居在家，以積蓄為生。

---

86 〈張若名生平〉，《張若名研究資料》，頁 93。

時至 1947 年，楊堃受聘為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而張若名則為中文系教授，並在外語系講授法語。夫妻二人於 1948 年 4 月抵達昆明。當時，雲南經聞一多(1899-1946)、李公樸(1900-1946)事件，反內戰情緒極為高漲。原本夫妻二人離開北京或許有遠離政治的考量在內，但政治在此時卻已是無處不在、無人能逃了。楊堃逐漸向共產黨接近，而張若名也開始閱讀蘇聯文學，並重拾自己擱置已久的馬列主義書籍。1949 年底，中共接管昆明，楊堃和張若名無可迴避地踏入了新政權。

在張若名生命的最後 8 年，我們看到了一位遠離政治二十多年的知識分子有意識地努力向中共建立的新政權靠近。1950 年，張若名加入民盟，並連續幾年不斷寫申請書，深刻進行自我批評，想要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她一直以為自己在歐洲退出的是中國共產黨）。她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著作，並閱讀高爾基、托爾斯泰、季莫菲耶夫等被視為無產階級作家作品。這些努力，在其 1956 年發表的〈歐洲舊現實主義的成就和缺陷〉一文中清晰可見。張若名不僅開門見山地指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舊現實主義有本質上的不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和馬列主義的人生觀，在歷史的變革中和在革命實踐的基礎上，來反映現實，並且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87] 還旁徵博引地引用上述政治家和文學家的文字

---

[87] 張若名，〈歐洲舊現實主義的成就和缺陷〉，原載《雲南大學學報》，期 1（1956 年 6 月），收入黃嫣梨編著，《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7），頁 272。

來達到論證目的。可見，此時的張若名就像 1920 年代退團前的自己，努力用無產階級理論框架來重新闡釋自己所專長的文學領域，政治最終還是慢慢滲入了學術。

隨著反右運動的擴大化，張若名感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這既有可能因為她是一位接受國外教育的歸國學者，也有可能是她曾經退團的經歷所致。1958 年 6 月 18 日，張若名在雲南大學跳湖自殺，結束其 56 歲的生命。到底是要證明自己的政治清白，還是厭倦了無休止的政治鬥爭，再也無人知曉。

在這三位女性中，相較於郭隆真緊隨中共以及張若名在學術和政治之間的擺蕩，劉清揚回國後的經歷最為複雜。劉清揚和張申府於 1923 年年底回國。此後，劉清揚一反在歐洲的居家狀態，重新活躍在公共領域中，大力提倡和實踐男女平權、女性參政和家庭管理等女權主義議題。她四處奔走、創辦報紙、創立社團、組織集會、發表演講，並游走於國共兩黨之間。這種在公共領域的絢麗回歸，仿佛讓人又回到五四時期。劉清揚仍是那個振臂高呼、眾人回應的檯面女界領袖，而在歐洲這三年的居家光陰，好像只是在其生命裡按了一個暫停鍵而已。

劉清揚回國後的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首先，劉清揚回國不久，便立刻與昔日一起參加五四運動的女界同志李毅韜、鄧穎超等人在天津創辦《婦女日報》。在《婦女日報》刊行的九個月中，這份刊物幾乎涵蓋了此一時期最主要的婦女解放議題，如反對父權壓迫、提倡男女平權、主張自由戀愛、以及強調現代家庭管理等。同時，因為劉清揚、鄧穎超

等人還是中共黨員（儘管表面上這一身分是隱蔽的），《婦女日報》也發表很多有關馬克思主義和婦女解放之關係，以及俄國婦女解放、中國女工的文章。尤其是 1924 年列寧去世時，《婦女日報》花費相當大的篇幅來悼念列寧。劉清揚甚至將自己參加列寧追悼會的演講，也發表出來。

作為《婦女日報》的總經理，劉清揚自己撰寫了一些關於整理家庭和女性節育等方面的文章。[88] 大部分對《婦女日報》時期劉清揚進行研究的學者，都強調其在宣揚婦女解放方面所扮演的進步角色。[89] 此點固然不假，但是我認為，這些文章最有意思的一個地方在於，劉清揚非常喜歡強調自己的歐洲經歷。她在行文中，總是以一種看似輕描淡寫、實則舉重若輕的方式強調自己對歐洲社會，尤其是對歐洲婦女、婚姻和家庭的瞭解。比如劉清揚發表〈我所認為目前應當作的事〉，第一句便是「我歸國不久，已受了許多新感觸。使我感動最深的，莫過於虛浮之習，日益利害」。在文末又說，「歐洲的東西，並不都是好的……但令機會許我，我必在本報上，盡我的能力，揭開他的假面具」。[90] 在另一篇答讀者來信的開頭又說，「我在歐洲三年所受最大教訓在認：作事

88 如清揚，〈我所以提倡婦女勤勞〉，《婦女日報》（天津），1924 年 1 月 18 日，第 1 版；清揚，〈我主張限制生育的一個理由〉，《婦女日報》（天津），1924 年 1 月 22 日，第 2 版等。

89 如孟憲玲，〈劉清揚與《婦女日報》〉，《回族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88-92；白潤生，〈《婦女日報》的創始人劉清揚〉，《縱橫》，2002 年第 11 期，頁 45。

90 清揚，〈我所認為目前應當作的事〉，《婦女日報》（天津），1924 年 1 月 1 日，第 2 版。

必須腳踏實地」。[91] 對劉清揚而言，她離國已有數年時間，如今回國必須要有一個重新確立其在婦女解放領域中話語權的切入點。其歐洲經歷和對歐洲社會和女性的瞭解，正是一個主導性的切入點，加重了砝碼，可以讓她再次建構自己在中國婦女解放議題上的權威形象。

除了創辦《婦女日報》外，劉清揚還以組建團體的方式動員社會、參與國家政治。1924 年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作為共產黨員的劉清揚和大部分同志一樣，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但在 1927 年國共聯合破裂之前，劉清揚似乎並未過多強調自己的黨員身分，而是複製五四時期的方法和策略，以女界身分強調女性對國家政治的參與。如 1925 年，孫中山決議支持國民會議促成會，以制衡北京段祺瑞政府，當時全國掀起了成立國民會議促進會的浪潮。劉清揚在上海，積極推動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成立，後被派去北方參與全國總會的創立。這時，劉清揚所採用的策略和五四時期是一樣的，都是以主動的方式將女界嵌入到國家政治之中，謂「有女界促成會處代表數應與男界同，如無此辦法，則將來促成會派代表時，至少應有一女代表」。[92]

劉清揚回國後的政治生涯，在 1927 年遭遇到第一次挫敗。這年，國共兩黨聯合戰線破裂，各地掀起反共浪潮，李大釗、郭隆真等在北京被捕，劉清揚勉強逃出，躲過這場牢

---

91 清揚，〈答沈克思君〉，《婦女日報》（天津），1924 年 1 月 18 日，第 4 版。

92 〈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委員會議紀〉，《申報》（上海），1925 年 1 月 30 日，第 15 版。

獄之災。但是，她心中不免恐慌，加之又身懷有孕，劉清揚選擇退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回到北京，和張申府以及女兒在清華園生活（當時張申府是清華哲學系的教授）。[93]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劉清揚迎來其政治生涯的又一次高峰。她先是在北京被推選為北平婦女救國聯合會主席，但不久因作為愛國進步知識分子被捕入獄三個月，出獄後又成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常務委員。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她代表華北人民抗日軍政委員會到武漢等地演講，以尋求社會各界對華北抗日武裝力量的支持。同時和李德全(1896-1972)等人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參加宋美齡(1897-2003)成立的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主要負責婦女幹部培訓、實習，並輾轉武漢、重慶、桂林、香港等地，從事各種婦女工作。1944 年劉清揚加入民盟，次年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民盟中央婦女委員會主任。就此而言，劉清揚代表遊走在國共兩黨之外的知識分子，試圖通過社會組織和社會運動的方式，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

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歷練中，劉清揚已經能夠相當嫻熟地將愛國內化為自己身分的一部分。1943 年，劉清揚在《反攻》雜誌上發表〈紀念「九一八」並悼「九一九」慈母逝世兩周年〉一文。從標題便可見劉清揚將國家危難與個人孝道糅合之努力，更不用說在文中將自己的個人成長史完全寫成一部自其出生便有意識地為飽受磨難的國家分憂解愁的個人歷史：「國難的深重，似乎是與我有生以俱來的天賦的憂

93 劉方清，〈我的母親劉清揚〉，《炎黃春秋》，2005 年第 1 期，頁 40。

慮」。1900 年八國聯軍侵佔天津時，劉清揚 6 歲，她便記得「當那時我耳聞隆隆的炮聲，目睹著活人倒斃，又在失陷之後，窒息著被異族統制的奴隸氣息。凡這一切，都牢記在我的幼稚心靈，永不能忘記」。[94]

國共內戰爆發後，與國共兩黨均有來往的劉清揚做出了自己的選擇，逐漸傾向共產黨。這不僅表現在 1946 年 7 月她接受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1897-1983)的邀請，前往解放區參觀。且在 1948 年年底，劉清揚選擇與政見不同的張申府斷絕夫妻關係。劉清揚的選擇其實有跡可循。在歐洲時，劉清揚或許限於語言和學識，多以張申府是瞻。但回國后，隨著劉清揚在國內參加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聲望再起，再加之事務繁多，經常往來各地，二人之間便很難再維繫原來不對等的關係模式。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當劉清揚憂心國事、四處奔走時，張申府這個奉行羅素式性愛自由的哲學家曾兩次出軌。劉清揚憤而離開張申府，直到 1944 年二人才又復合。[95] 1948 年 10 月 23 日，身在北京的張申府在《觀察》上發表〈呼籲和平〉一文，倡議國共停止內戰，共商和平。這無疑有逆於當時國民黨大勢已去、共產黨節節勝利的軍事和政治現實。同年 11 月 16 日，香港民盟在《人民日報》發表聲明，宣佈張申府背叛人民和民主，決定開除其盟籍。[96] 一個月後，劉清揚致函民盟常務委員沈鈞儒

94 劉清揚，〈紀念「九一八」並悼「九一九」慈母逝世兩周年〉，《反攻》（重慶），卷 14 期 2-3（1943 年 9 月），頁 13。

95 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pp. 88-89.

96 〈民盟總部發言人聲明，開除民主叛徒張申府〉，《人民日報》（北京），1948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有關張申府撰寫《呼籲和平》一

(1875-1963)等人，申明於公於私和張申府完全脫離關係。「正當此人民解放軍捷報頻傳空前勝利，使反動的蔣政權即將垮臺之際，張申府竟發出如此荒謬絕倫的呼籲......他既如此背叛人民甘心為虎作倀，清揚故特向本盟總部諸同志及全國民主人士聲明：從今後，不但在公的方面，與張申府完全脫離合作，並在私的方面，也永久斷絕二十七年來夫婦關係......」[97]

儘管張申府在 1980 年代接受 Vera Schwarcz 採訪時說，劉清揚這一舉動有可能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孩子。但劉清揚這種選擇和其與中共距離越來越近無疑是有直接關係，這種立場的公開表達也受到中共肯定。1949 年 2 月 3 日，劉清揚被邀請站在天安門上觀看解放軍進北京，9 月，又受邀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清揚還曾在中央和地方政協、民盟中央、全國婦聯和全國紅十字會等各單位機構任職。但即便是這樣的政治立場，也仍未能使劉清揚在文革中免受政治迫害。1968 年 2 月劉清揚被捕，一直到 1975 年 5 月才被釋放。據女兒劉方清回憶，即使在獄中，劉清揚都一直在表達對中共的忠誠，「我的一生是忠於革命、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祖國的」。[98] 出獄後不久，劉清揚於 1977 年 7 月 19 日因病去世。

郭隆真去世於 1931 年，張若名 1958 年，劉清揚 1977

文的具體背景，以及民盟和其他知識分子對張申府的具體批評，見 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pp. 190-198.

97 〈張申府背叛民主為虎作倀，劉清揚嚴予斥責〉，《人民日報》（北京），1948 年 12 月 26 日，第 3 版。

98 劉方清，《我的母親劉清揚》，頁 37。

年。她們的生命或已終結，但是，對她們紀念式的形象塑造卻沒有結束。郭隆真去世最早，對她的紀念卻是相當豐富。1941 年 5 月 5 日(恰在 5 月 4 日五四紀念日之後一天以及郭隆真去世十周年) ，鄧穎超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紀念我們的女戰士郭林一同志〉一文。鄧穎超在五四時期曾與郭隆真一起奮鬥，1941 年的鄧穎超，既是周恩來的妻子、又是中共高層幹部，由她來寫這篇紀念文章，再恰當不過。文中，鄧穎超用充滿感情的筆觸描述郭隆真在五四運動中及其後於革命工作中的英勇表現，甚至還像身臨現場般細緻地描述郭隆真被押赴刑場處死的場景。鄧穎超對其總體評價是，「她有火樣的熱情，愛護著國家民族；亦同樣以火熱的高度，憎恨著當時的親日賣國賊。......在「五四」運動中，在她的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證明著她是一位堅決勇敢，不顧一切，專誠不懈的奮鬥者」。[99] 在中共看來，郭隆真儘管去世很早，但從對五四、中共和國家的貢獻來看，其死亡是毫無爭議的。因此，這篇文章可視為中共官方對其蓋棺定論，郭隆真由此成為一名中共戰士 / 烈士。

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相當長時間裡，郭隆真的名字大都只是閃現在各種對周恩來、鄧穎超等人於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的各類記載中。直到 1980 年代，[100] 才出現從

---

[99] 鄧穎超，〈紀念我們的女戰士郭林一同志〉，《新華日報》(重慶)，1941 年 5 月 5 日，第 2 版。

[100] 1980 年代不僅是中國政治重要的轉折時期 (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開始)，也影響了歷史書寫方式，出現以毛澤東為中心論述以外的其他歷史書寫，原本被遺忘或者被壓抑的歷史如今有了重新浮現的可能性。Vera Schwarcz 將這一變化稱之為「歷史書寫的復

其他視角對郭隆真的書寫和紀念。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黃庭輝，從回族視角、以文學描述手法書寫關於郭隆真的文章和傳記；以及郭隆真家鄉河北省大名縣從地方史的角度，對郭隆真一系列物質和文字的宣傳（如 1986 年郭隆真烈士紀念碑在大名縣落成，這一消息還被《人民日報》報導）。[101] 這些回憶、紀念和研究，都建立在郭隆真是一位中共認定的革命烈士的前提下。反之，這些回憶、紀念和研究也強化了這一身分，並對其公共形象進行刻板化處理。[102]

相較於郭隆真沒有直系後人、中共成為其主要塑造者，張若名去世後的正名，主要是由其長子楊在道完成。張若名在 1958 年自殺身亡後，其所在單位雲南大學立刻針對張若名召開批判大會，民盟也隨之開除張若名的盟籍。自 1980 年代開始，楊在道便通過各種途徑為母親正名。當時，他寫信給鄧穎超，請求為張若名平反。鄧既是張在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同級同學和五四志同道合者，又是中共和國家高級領導人。鄧穎超介入後，不僅雲南大學黨委為張若名作出政治結論，認為「張若名同志一生為革命，為人民做了許多

興」(Historiographical renaissance)。Vera Schwarcz, "Out of Historical Amnesia: An Eclectic and Nearly Forgotten Chinese Communist in Europe," *Modern China* 13:2 (April 1987), pp. 177-183.

101 〈郭隆真烈士紀念碑在大名縣落成〉，《人民日報》（北京），1986 年 4 月 7 日，第 4 版。

102 姜海龍，〈「革命者形象」下的女權主義者郭隆真〉，收入王政、陳雁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158-171。

有益的工作，政治歷史清楚，無重大政治歷史問題」，[103] 民盟也恢復其盟籍。

除了在政治上為母親平反，楊在道更致力於從資料和學術上推動對張若名的研究，試圖在近代歷史上為母親贏得應有的地位。一方面，他努力搜集張若名的各種資料和出版物—比如在北京、天津報紙上徵尋張若名曾經出版的《剩餘價值》和《階級鬥爭》兩本書，並據此撰寫多篇學術性的張若名傳記，如〈五四時期的張若名〉、〈張若名在法國〉、〈中國的第一位法國女博士——張若名〉等。[104] 1995 年，楊在道還編輯出版《張若名研究資料》一書。這些文章和書成為後來學者研究張若名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楊在道還更進一步，與海外學者黃嫣梨、陳敬堂和 Marilyn A. Levine 等人建立聯繫，將張若名的研究推至一個更為廣泛的學術網絡。其中，黃嫣梨教授對張若名研究著力甚多。她不僅發表〈張若名與五四時期天津婦運〉等學術論文，還編輯出版《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女愛會」、「覺悟社」與「共青團」的婦女先鋒》一書（1997 年在香港出版）。從書名來看，黃嫣梨將五四與中共定位為張若名生命中的重要節點。可以說，在楊在道和各位學者的共同推動下，張若名儘管在實際的中共話語體系中聲名不顯，但她卻以學術對象的身

103 〈中共雲南大學委員會：關於張若名同志的政治歷史結論〉，《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頁 220。

104 如〈五四時期的張若名〉，《黨史資料與研究》，1989 年第 2 期，頁 41-49；〈張若名在法國〉，《傳記文學》，1990 年第 6 期，頁 62-67；〈中國的第一位法國女博士——張若名〉，《新文學史料》，1993 年第 4 期，頁 144-146。

分，成為一位在近代政治運動史、女權運動史以及中法學術交流史領域中留有大名的「婦女先鋒」。

相較於烈士郭隆真和先鋒張若名，劉清揚在去世後的定位相對模糊一些。這一方面是因為劉清揚本身和中共的關係更加複雜，加之對劉的定位主要是在文革後對冤假錯案進行平反的國家政治層面上進行的。1979 年 8 月 3 日，劉清揚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主持人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劉瀾濤(1910-1997)，鄧小平(1904-1997)、宋慶齡(1893- 1981)、烏蘭夫(1906-1988)、鄧穎超等中共和國家領導人也前來參加追悼會。會上，由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1911-1992)致悼詞。康克清回顧劉清揚的一生，著重講述她在五四及抗戰時期的活動。對劉清揚在歐洲參加巴黎社會主義小組及入黨的經歷，則以「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去法國勤工儉學」一句帶過。官方對劉清揚的評價是，她「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為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為爭取婦女解放，做出了不少的貢獻」。[105]

待中共和國家為劉清揚平反後，對劉清揚的書寫才多了起來。主要集中於劉清揚在五四時期的活動、中共早期歷史的地位（尤其強調劉清揚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與《婦女日報》的關係，及其回族身分等方面。其中，劉清揚的女兒劉方清於 2005 年發表〈我的母親劉清揚〉一文，十分全面地回溯了劉清揚的一生。該文為讀者提供很多歷史細節

105 〈全國婦聯前副主席、四屆政協常務委員劉清揚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鄧小平宋慶齡等送花圈，周建人等參加追悼會〉，《人民日報》（北京），1979 年 8 月 4 日，第 4 版。

和照片，頗為生動地將劉清揚的一生刻畫為自幼便有強烈愛國意識的女性，尤其是在 1949 年後，更是以對中共和國家的忠誠為首重。可以說，劉方清筆下的劉清揚呈現出一個追逐者的形象。她敏銳地捕捉到愛國、女權、救亡的社會思潮和現實動向，身體力行地參與五四運動和抗日救亡中，並有意識地向主流政治話語靠近。反倒是 1980 年代由 Vera Schwarcz 對張申府進行的採訪，呈現一個張申府眼中的遊走在官方話語之外的劉清揚形象。她可以過著小婦人的居家生活，卻也可以為了國事而離家奔走；她可以積極聯合國共兩黨動員婦女，卻也膽怯於國共聯合陣線破裂後的白色恐怖；她可以將孩子寄放在法國而隻身與張申府去德國，但卻也能為了保護孩子免受政治風波，毅然決然地割斷與張申府二十多年的感情。這樣的劉清揚，其形象更加豐富。就像李德珠所言，是一位糅合了「中國人」、「人」和「女人」三重身分的女性。[106] 但是，這種形象卻只能存於張申府的記憶和一個外國學者的筆下，而未能進入官方話語體系。

經由國家、政黨、地方政府、研究者、友人、親人等不同力量的塑造，郭隆真、張若名和劉清揚呈現出不同的形象。其中一以貫之的則是這三位女性的五四經歷，它們反覆出現並成為界定其形象的關鍵點。這固然與這三位女性身為五四參與者的身分有直接關係，但也與佔據主導地位的中共對五四的政治和歷史定位有關。中共自 1921 年成立後，便一直強調五四的反帝反封建性質，以及對中共成立的促進作

---

106 李德珠，〈「中國人」、「人」和「女人」——從社會性別視角審視劉清揚的三重身分〉，《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頁 172-186。

用。尤其是毛澤東在 1939、1940 年發表一系列文章，更將它提升至開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地位。[107] 由是，這場最初以在校學生為主的政治運動，在中共政治話語體系中便獲得廣被認可的合法性地位。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國家到地方各單位，每逢五四均會舉行各種紀念活動。像《人民日報》這樣的官方媒體，亦發表紀念性文章，並報導各地各單位的紀念活動，更確立五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歷史中的地位。正因為五四在中共話語體系中的重要性，郭隆真、張若名和劉清揚的形象塑造者便反覆強調其五四經歷，以此獲取話語權，定位她們在政治和在歷史中的形象。尤其是張若名和劉清揚，她們在 1949 年後曾遭到政治批判，其家人和研究者便以她們的五四經歷為槓桿，與政黨和國家權威進行對話，為其正名。由是，五四運動在這些女性故去後，依然在她們的政治生命和歷史生命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結　論

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相聚在五四、散逸在歐洲，又被中共政治統合。這樣的生命歷史，為我們揭示了近代婦女在實踐女權和婦女解放等話語方面的豐富面向。從近代婦女史的展開來看，這三位女性是晚清以來女權主義主張和實

107 梁磊，〈建國前中國共產黨人關於五四運動評論述評〉，《黨史研究與教學》，2002 年第 3 期，頁 40-44。

踐——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受益者。五四運動的爆發，又使女性群體以行動的姿態將女界嵌入愛國話語和實踐中，從而形成校園之外的人際關係、代際經驗和社會認同。這些關係、經驗和認同無疑有助於她們在歐洲異域上生存下來，但同樣地，也讓她們未經多少掙扎便進入了政黨組織的勢力範圍中。此後，和大多數在國內的女性一樣，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一直在政黨、愛國和女權這些話語中進進出出，試圖尋找自我定位。郭隆真以政黨為歸依，相信中共是尋求國家出路和婦女解放（尤其是工農婦女解放）的唯一力量。劉清揚成為游離政黨內外的社會活動家，她借助國共兩黨，但又不完全依賴它們，試圖走第三條道路來保障婦女和兒童利益，並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張若名似乎更多繼承了五四時期的個人解放風格，她加入中共黨團組織，但卻不滿逐漸體制化的政黨對個體（尤其是對個體女性）的掌控，遂轉向學術，以學術為自我實現的途徑。三位女性代表了當時中國知識階層女性的三條道路：以政黨組織求解放、以社會運動求解放、以個體努力求解放。可以說，她們既是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受益者，又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踐行者和推動者。

甚至，我們不必拘泥於「性別」這一視角來看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她們三位固然是女性，但同樣也是近代知識人代表。她們代表了近代知識人的普遍軌跡：離開家庭、家學和家鄉。因教育進入學校和城市，由此積累起現代性的文化資本，並經由參與政治運動的方式來獲取社會資本，最終與政黨權力進行磋商和對話。她們見證近代教育的發展，以及學生作為社會新興群體參與愛國運動的實踐，也親歷中共

從最初那個以非正式關係（如個人私交、同學關係、同鄉聯繫、五四情誼）形成的政黨，逐漸體制化為列寧式紀律嚴格的政黨，直至最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在與這些主流話語和體制的互動過程中，她們和其他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既有認同與合作，亦有妥協和遠離。就此而言，從長時段也能看到打破「五四世代」整體性或者打破「中共政治」宰制性後，近代知識人作為歷史人物所呈現出的複雜性和豐富性。

再大而言之，劉清揚、郭隆真和張若名的生命歷史為思考歷史人物形象建構也提供了借鑑。她們見於歷史的生命始於五四運動，之後的經歷和人生便不斷地被編織到婦女解放運動、愛國主義運動以及政黨和國家權力的網絡中。當她們生命終結時，和中共關係的遠近決定了她們在國家官方話語中的不同定位。但生命的終結並不等於形象塑造的終結，即使在她們故去後，不同的撰寫者還會根據各自的目的，繼續豐富對她們形象的塑造，尤其強調她們在五四運動中的經歷。其中有家人、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也有學界的研究者，亦不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介入。由此，這三位女性的代言者們依據各自的訴求，一層又一層地累積、疊加對她們形象的建構，最終形成了我們的豐富認知。

徵引書目

一、報刊

《人民日報》（北京），1948、1979、1986。
《人物雜誌》（上海），1946。
《大公報》（天津），1923、1927。
《反攻》（重慶），1943。
《申報》（上海），1919、1920、1924、1925。
《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堂校友會彙刊》（天津），1916。
《時代生活》（天津），1936。
《時事新報》（上海），1921。
《益世報》（天津），1919。
《婦女日報》（天津），1924。
《晨報》（北京），1921。
《新華日報》（重慶），1941。
《覺悟》（天津），1920。

二、專書

中央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編，《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種本第五集。北京：中央檔案館，1994。
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項不詳，198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輯 1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五四愛國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冊 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中國青年社編輯，《光輝的五四》。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

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五四運動在天津》編輯組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王政、陳雁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王獨清，《我在歐洲的生活》。上海：光華書局，1936。

朱昌平、吳建偉編，《中國回族文學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高文德編，《中國少數民族史大辭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張允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張申府，《所憶：張申府憶舊文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張若名著、楊在道編，《紀德的態度》。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張恩棠，《回族革命女英雄郭隆真》。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1988。

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冊 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陳碧蘭，《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

彭述之口述，程映湘、高達樂(Clande Cadart)編撰、周任新、葉向陽翻譯，《彭述之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

森時彥著，史會來、尚信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小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黃庭輝，《郭隆真》。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

黃嫣梨編著，《張若名研究及資料輯集：「女愛會」、「覺悟社」與「共青團」的婦女先鋒》。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7。

楊在道編，《張若名研究資料》。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5。

鮮于浩，《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史稿》。成都：巴蜀書社，1994。

蘇雪林，《蘇雪林作品集·短篇文章卷》，冊 1。臺南：財團法人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2006 年初版，2011 年再版。

Feuer, Lewis S.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s: 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Movements*. New York & London: Basic Books, 1969.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Gilmartin, Christina Kelley.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Levine, Marilyn A.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Schwarcz, Vera.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三、論文

白潤生，〈《婦女日報》的創始人劉清揚〉，《縱橫》，2002 年第 11 期，頁 45。

宋少鵬，〈賦予五四運動以社會性別：女學生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6 期，頁 60-66。

孟憲玲，〈劉清揚與《婦女日報》〉，《回族研究》，1994 年第 3 期，頁 88-92。

馬惠卿，〈五四運動在天津〉，《近代史資料》，1958 年第 2 期，頁 79-111。

梁磊，〈建國前中國共產黨人關於五四運動評論述評〉，《黨史研究與教學》，2002 年第 3 期，頁 40-44。

劉方清，〈我的母親劉清揚〉，《炎黃春秋》，2005 年第 1 期，頁 37-45。

楊在道，〈五四時期的張若名〉，《黨史資料與研究》，1989 年第 2 期，頁 41-49。

楊在道，〈張若名在法國〉，《傳記文學》，1990 年第 6 期，頁 62-67。

楊在道，〈中國的第一位法國女博士——張若名〉，《新文學史料》，1993 年第 4 期，頁 144-146。

鄭永福、呂美頤，〈關於近代中國「女國民」觀念的歷史考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4 期，頁 58-63。

Bailey, Paul. “The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115, September 1988, pp. 441-461.

Levine, Marilyn A. "Transcending the Barriers: Zhang Ruoming and Andre Gide."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23:3, Spring 1990, pp. 4-23.

McElroy, Sarah Coles. "Forging a New Role for Women: Zhili First Women's Normal School and the Growth of Women's Education in China, 1901-21." In Glen Peterson, Ruth Hayhoe, and Yongling Lu, eds., *Educ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p. 348-374.

Schwarcz, Vera. "Out of Historical Amnesia: An Eclectic and Nearly Forgotten Chinese Communist in Europe." *Modern China* 13:2, April 1987, pp. 177-183.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nd the Image Making of the May Fourth Women: With the Case Study of Liu Qingyang, Guo Longzhen, and Zhang Ruoming

Fang Q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nder and politics by focusing on the life stories of three May Fourth women: Liu Qingyang, Guo Longzhen, and Zhang Ruoming. To some extent, these three women represented the prototype of the May Fourth generation, but the diversity seen in their family backgrounds, social roles, and personal styles indicated their future divergence.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ir life trajectories were closely interwoven with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CP determined their destinies and imag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eanwhile, their progenies and researchers also attempted to challenge and revise these CCP-sanctioned images. In many ways,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life stories and the image-making of these three May Fourth women reveal the complex dimensions between gender and politics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Generation, Liu Qingyang, Guo Longzhen, Zhang Ruoming, the Power of the Political Party